

清代前期臺灣府城的官署園林及遊憩空間 之創建

蔡承豪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

摘要

臺灣府城長期為臺灣政經中心，並係官吏紳商的主要聚集及往來之地。隨大清治權展開後，府城內外除修築與新建各式行政與軍事設施外，另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官紳休憩與交誼的空間亦隨之而起。

在本籍迴避政策下前來的各級官員，除致力公務，公暇之際並有著生活經營及休閒活動；休閒看似是個人的調劑與選擇，但有時更涉及到社會領導群體間互動關聯、個人創造能力的投入與展現，及未來仕途之複雜考量。故散落於府城內外的官署園林及遊憩場所等讓官員暫時卸下俗職差異，並藉由文會及賞遊包裝建構而成的休憩「異質空間」（heterotopias）之營造，是在何種背景脈絡及意識下開展，便成為了解清代臺灣官紳活動時值得觀察的面向。這些從領臺初期至 1740 年代官員所建立起供宴飲雅集的休閒空間，其類型包括：（一）獨立園林：北園，（二）附屬公衙的官署園林，（三）廟宇佛寺，（四）自然地景，（五）民間設施等。除了新造，更多有改建或增補自前朝所遺留的官民建築。而休憩空間領造與詮釋者，係以道臺、知府為首的文官為主，這些深受中國文人交誼往來傳統影響的官僚群們，將庭園建築、佛寺賞遊、園林文會、伶人奏演等移植到府城，奠定府城地區官署園林與休憩空間的走向。

關鍵字：異質空間、自然地景、佛寺、園林

壹、前言

臺灣府城長期為政經中心，而隨大清治權入主，為因應更大規模的統治開展，各式行政與軍事設施逐步修築與新建於府城內外，以供文武官員、幕僚及吏員等使用。而就各項建設被後世研究者關注的比例觀之，主要集中在廟宇、城牆、官署、軍事設施與港口等各項指標建設，尤以前二者，除因其可呈現城市某種建設或行政管理的邏輯外，更包括建築實體留存於否的現實問題。¹

除探究建設源由與規制外，官員們在何種理念上建構與經營城市內的各式建設，亦是重要課題。官員除致力於公務，公暇之際並有著生活經營、人際互動及休閒活動的需求。休閒（Leisure）看似是個人的調劑與選擇，但就個人社交理論（Personal Community Theory）而言，由家庭成員、同儕、鄰居、朋友、社團伙伴、同事等所組成的社會團體，對遊憩的選擇可能有優先決定的地位。官紳間的休閒活動，由於彼此間涉及了複雜且微妙的權力關連，有時更牽連到社會領導群體間互動關聯、個人創造能力的投入與展現，及未來仕途等多重考量。故如何藉由營造休憩與交誼的空間，進而展現個人自身品味及進行上下交誼，成為部分為官者關心的課題。故基於本籍迴避制度來自各地的官員，在有任期限制的情況下，於臺灣這個非其原籍的海外新附領土當中如何建造休憩設施，並合理化這種「不務正業」的行動，亦成為影響其投入建設時的考量之一。

至晚在 17 世紀中葉，臺灣已有古典庭園設施之濫觴，後量與質陸續增展，不少名園蔚為地方社交中心，展現建園者及家族風範。² 早期研究偏向私家園林的整體性的背景介紹。³ 至曾惠裏首對臺灣傳統園林的發展進行貫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計畫「曲徑通幽與官紳場域：清代臺灣府城官署園林及遊憩空間」（計畫編號：110-2410-H-136 -001）之部分研究成果。期間蒙林麗江教授、余玉綺學友提供諸多研究建議，撰文期間獲朱曼云碩士多所協助，另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1 陳冠妃，〈城市建設與圖像表達：以 1766 年臺灣知府蔣允焄《東瀛紀典》為例〉，《臺灣史研究》，26 卷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2。

2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5 年），頁 76。

3 盧嘉興，〈臺灣的名園〉，《幼獅月刊》，44 卷 5 期（1976 年 11 月），頁 15-20。李乾朗，〈傳統建築—臺灣的古庭園〉，《房屋市場》，88 期（1980 年 12 月），頁 94-99。

時性彙整開創研究。⁴ 賴恆毅則討論了臺灣道署中的休閒空間設計，認為休憩空間給予官員情感宣洩的渠道，惟僅關注到澄臺與斐亭。⁵ 蔡承豪則以臺灣府署鴻指園為例，點出過往較少關注的衙署園林發展趨勢，認為署與園提供官員共構出仕與隱的二元空間。⁶ 而常作為文人遊憩交誼空間的佛寺，其間亦涉及官員的介入，如陳冠妃藉由從北園到海會寺的案例，指出帝國以佛寺為包裝，將前朝庭園扭轉為官員拜佛的所在，有其政治展示意義。⁷ 而陳至忻指出清初在臺官員移植了江南的逸樂活動模式，用於園林與佛寺的興修當中，亦以海會寺為例，點出建設背後的利益爭奪。⁸ 另有諸多研究者從內外部書寫流變，探析清代臺灣園林文學，及對園林精神進行解析。⁹

概觀清初臺灣官吏的休憩空間，除園林與寺廟古剎，亦包含自然地景，且更涉及到前朝遺留的諸多建築。然現今的研究尚缺乏一整體視角觀看場域變遷的意義，連帶解釋由之衍伸出的眾多文學創作與文化地景論述時有所侷限及誤讀，對了解清代初期散落於府城內外的官署園林及遊憩場所之流變及蘊含其間的官紳互動網絡，實有所缺憾。這些場域，或供自身公暇時隱身園林百景內思索自我、頤養性情；或讓官員暫時卸下俗職差異，進行文會及賞遊，包裝建構看似純粹的休憩場域。但園林、遊景並非僅是真實世界的摹寫，反是鏡像反射實務場域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其建構出自於對真實基地的對抗，因此異質空間的面貌是絕對異於其所反思、對壘的真實基

4 曾惠裏，〈臺灣傳統園林的歷史發展及空間特性〉（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

5 賴恆毅，〈清代臺灣地理空間書寫之文化詮釋〉（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 年）。

6 蔡承豪，〈清代臺灣府署「鴻指園」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8 卷 2 期（2020 年 12 月），頁 137-196。

7 陳冠妃，〈由熱蘭遮市到臺灣府城：臺南城市型態的演變與城市社會的形成（1624-186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7 年），頁 77。

8 陳至忻，〈園林與佛寺：清初臺灣官紳的交誼及其場所的重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 年）。

9 龔顯宗，〈論《荅洲文稿》的臺灣書寫〉，收入朱歧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頁 10-11。許惠玟，〈由《寓望園記》到《提室十三勝記》：清代臺灣園記散文探析〉，收入朱歧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頁 339-368。黃慶雄，〈清領時期臺灣隱逸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頁 127-162。王建國，〈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論清初臺灣園林／寓望園〈書齋八景〉之書寫語境〉，《文與哲》，36 期（2020 年 6 月），頁 205-255。

地。¹⁰ 在仕宦任期當中，既要官場運作，卻又欲與現實保持某種距離，以維持文人的自身期許。於仕與隱間，官署與園林，共構成仕與隱的二元空間語境（context）。這些藉由文會及賞遊包裝建構而成的「異質空間」，正提供了遊走切換的過渡，甚至成為其新築及改造舊有建築時的思想依據。

故本研究即希冀：一、重建並歸納清初府城及鄰近地區重要的官署園林及遊憩空間之變遷面貌及類型脈絡，二、進而對此類異質空間的解析，探查其背後臺灣官紳場域的多重樣貌。因至 18 世紀中葉，官署庭園、亭室等交誼休憩設施興修開始進入高峰，尤以蔣允焄、蔣元樞等人為代表。¹¹ 相對於此，從清帝國領臺至約 1740 年代，可謂是一摸索與奠基時期，故本文即以此段區間為探討重點，以圖回應前述課題。

貳、留下的「遺產」

明中葉以降，於經濟與文化繁盛的江南地區，官員、仕紳、商賈等人士，逐步共構出頗具規模且數量可觀的遊憩空間。¹² 除自然盛景，人為空間當中，以園林與佛寺最為重要。這樣的風潮，也影響至臺灣。

一、興築熱潮下的擴增

園林除了樓閣亭臺、花木泉石等物質載體，並包含美學思想、哲學思維等精神呈現，使其具有休憩賞遊、文會酣暢、彰顯社會地位、傳達園主文化美學及情懷等多樣功能與面向。明中葉以降，隨商品經濟日益繁榮，社會日趨富庶，生活亦漸尚奢侈。而工匠階層人數的擴增與技術的提升，連帶提供興修的技術基礎，使園林興築風潮逐漸達到高峰，尤以江南為盛。¹³ 後即便歷經明清鼎革，但築園風尚仍持續延續，甚至連清代的統治階層亦熱衷園林

10 傅柯（Michel Foucault），〈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入陳志梧譯，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 年），頁 403-404。

11 蔡承豪，〈清代臺灣府署「鴻指園」之研究〉，頁 147-150。

12 康格溫，〈《園冶》與時尚：明代文人的園林消費與文化活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2-3。

13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頁 199。

興築與書寫，並反刺激了江南園林修築的另一股熱潮。¹⁴

除賞玩景致，園林場域更提供官紳間人際網絡交流與社會聲望的建立。因園林係經精心設計，對士大夫具有文化象徵的意義。而隨著明清時期經濟的發展，園林更有炫耀財富的外顯目的，是一複雜社會情境下的產物。藉由園林這個空間的營造，造園主得以呈現其富裕與精緻精神的場域，藉由住宿招待友人論交（旅邸），甚至有以開放園林提供百姓遊人賞玩而彰顯其成果者。¹⁵而築於市廛中的園林，成為了偏離日常生活的異質空間，這種空間本以遠離俗世為佳，但「市隱」理念的發揚，使園林不再偏居荒野，反以城市及近郊為構建據點。面對仕途的跌宕、社會的變革與政治上的衝擊等等，文人在園林中不但可以從自己得以掌控的再現山水林泉之中尋求寄託，還可以藉以書寫起興，重構自我，並於「息交」及「與眾」間，將私有空間與公共領域的界線模糊，在互動之間保持做為仕人的社會性。¹⁶因此園林內揉合各種空間功能的場域需求，以疊合園主隱逸欲求、家庭生活起居、社交宴遊及公共開放等功能。¹⁷故園林除了寄託文人對出世以及歸隱的理想之外，同時也是一個社交場域。

除於園林賞玩，原供靜修的佛寺，也漸次成為重要休閒場所。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歷程中，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至明中葉以降，文士與佛教寺院間的關係漸趨緊密。在明代晚期，佛教與仕紳的文化融合，使佛教與文人生活的每個片段都有所牽扯。而富庶的江南地區，更是掀

14 相關討論可參見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故宮學術季刊》，32 卷 3 期（2015 年 3 月），頁 21-30。

15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77-202. 巫仁恕，〈優游坊廬：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頁 137-191。

16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頁 73。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4 期（2017 年 12 月），頁 7-12。

17 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頁 31。

起了一陣佛寺捐獻的風潮，富商、仕紳等陸續成為佛寺經濟的重要來源。¹⁸另隨著旅遊活動興盛，搭配外遊而探訪或借宿於佛寺，或相約於寺裡聚會，則為明清文人交誼的重要項目之一。寺廟園林與宅園所提供的機能有類似之處，更提供了宗教上的心靈空間。故入寺並非全是其信仰，反而更是因佛寺中有著文人所追求的寧靜安詳景緻，士僧交誼互動以及信仰心境的相互映證更是重要的文化吸引力。¹⁹藉由宗教場域，官員們亦常言喻其對百姓的關心，則是另一種心境宣示。就此觀之，佛寺非僅是單純的宗教場域，更是一種文人運用的表述空間。

二、前人的遺產與權力真空下的領導者

清代來臺的官員，尤其是文職人員，也是廣義明清文人的一員。運用園林、廟宇等異質空間進行社交與逸樂的風俗，應是其熟悉且曾親身參與者。但清代來臺的官員與文士，必須面臨到多重的特殊處境。因官員抵達臺灣這個新附海島時，或多視為需要被重新整理成為帝國疆域一隅之地。但他們來到的並非是一個全然荒蕪之地，而是一個存留有諸多前朝遺蹟的所在，尤其集中於府城及周邊緊鄰地帶。

17世紀中葉，臺灣已有古典庭園設施之濫觴，如有通事何斌所興修的花園、明寧靖王府的「一元子園」、鄭經（1642—1681）的「潛苑」、「東壁樓」及「北園別館」、鄭氏諮議參軍陳永華（1634—1680）的「陳氏園」、隱士李茂春（？—1675）的「夢蝶園」等，另有若干寺廟園林。其建置目的，或為賞玩、或為隱逸等等不一。²⁰這幾位建園者的身份不一，主要是鄭氏王國的高層與皇室各遊憩空間。

何斌為荷蘭時代重要的通事與商人，其故居內據稱有「花園」，即日本

18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7-320.

19 巫仁恕、迪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頁83-85。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p. 110.

20 曾惠真，〈臺灣傳統園林的歷史發展及空間特性〉，頁11-36。

時代以前臺灣對園林建築的統稱，屬於私人宅邸。何斌既為當時重要人士，居所內擁有庭園以供交誼或休閒應不意外，並常被建築學者視為臺灣園林的初始個案。後其舊址在道光年間為府城鹽商吳尚新收購為邸宅，旁拓花園，置池水假山、迴樓曲榭等，這個吳園因而有「談者以為臺灣第一」之評論。²¹但何斌花園的樣貌並無相關資料可供還原。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一元子園與陳氏園。寧靖王府邸範圍大約為今之大天后宮與其東側的祀典武廟部分，其尚是寧靖王宅邸時之樣貌後世雖多有探究與還原²²，但一元子園的樣貌基本上仍甚模糊。而陳氏園則在乾隆前期的方志紀錄中已稱係屬荒廢。²³

相對之下，鄭經所擁有的潛苑、東壁樓、北園別館，其面貌及興築脈絡相對較為清晰，而夢蝶園則有延續之故事。鄭經至臺後，從其記錄明永曆 18 年（1664）至 28 年（1674）間的作品《東壁樓集》中，可看出其遊憩空間有二，分別為潛苑與東壁樓。這兩者是否係在同一處、亦或東壁樓即是安平鎮城（原熱蘭遮城）的某部分，仍待更多資料補充，但可以肯定鄭經出現在兩地的頻率不低。²⁴

鄭經自號潛苑主人，顯示該地的重要性。而潛苑的雅緻在鄭經詩作多有描述，如〈潛苑三洲〉一首即云：

一苑皆春色，三洲帶晚風。青山接碧漢，翠澗落晴空。漁艇出叢綠，
岸花到處紅。遠峰橫落日，長渚掛殘虹。流水搖溪月，輕煙籠岸楓。
江波逐返棹，霞影送歸鴻。疏竹開幽徑，芳林隱澤宮。清幽無限景，
何必羨瀛蓬。²⁵

此外，潛苑旁繞通海之溪，內有樓臺，可眺山溪急流、橫海沙洲（或即鯤鯨）與落日歸帆等各式遠致。而苑內山水疏竹、花木繁蔚兼備，並有曲徑

21 連橫，《雅言》（臺灣文獻叢刊第 1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72。

22 黃靜宜等，《臺南歷史散步》（臺北：遠流，1995 年），頁 90。

23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468。

24 張鴻愷，〈從《東壁樓集》及《延平二王遺集》看鄭經其人及明鄭王朝〉，《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7 期（2008 年 6 月），頁 171-172。

25 鄭經，《東壁樓集》（新北：龍文，2011 年；1674 年原刊），頁 234-235。

通幽之美。²⁶而《東壁樓集》書名由來的東壁樓，有一定高度，並有臺閣欄檻以供遠眺景色，從詩作當中推斷位於城西郭外，臨近水濱可能係在延平王府邸外近海處，由安平鎮城或即可抵達。鄭經似常居其中處理公務，更時有宴會於樓內舉辦，是其重要休憩場所。²⁷

但在永曆 28 年鄭經西征後，潛苑與東壁樓的相關紀錄便告消失。明永曆 34 年（1680），鄭經因為戰事失利而返回臺灣，復明之志逐漸消失，遂於洲仔尾擇地建造園亭。17 世紀指涉洲仔尾是一個較廣且浮動的地域範圍，除有田園，並是重要的南北要道、渡口及港口。鄭氏家族諸多成員之墳塋亦在洲仔尾，陳永華的花園同是在此區域。²⁸故在此修建專屬園林，是否受陳氏園影響，或是為了方便觀景與活動，不得而知。但翁佳音認為，洲仔尾地區在荷蘭時代便有「長官別墅」、「公司花園」等休閒建築，後來為鄭氏所接手，故鄭經也將其園亭選擇於此修築，有其延續脈絡。²⁹鄭經後便以此為主要活動地點，歡宴笙歌。³⁰此地又有紀錄稱為「承天府行臺」。³¹作為東寧王國統治者的主要活動地，其內設備應當相當完備且可觀，「峻宇雕牆、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的描述應甚為貼切。³²

漳州府龍溪籍的李茂春所築之夢蝶園（處），則是相對是一簡單之處。夢蝶園為法華寺的前身，地點位處於赤崁樓以南不遠處。李茂春曾在鄭軍中擔任參軍，後因故不再參與政務，並在該地構茅亭以居。³³而李茂春為陳永華之好友，兩人時常在此園交遊，陳永華遂為此園題名，更贈「夢蝶園

26 鄭經，《東壁樓集》，頁 113-114、286。

27 張鴻愷，〈從《東壁樓集》及《延平二王遺集》看鄭經其人及明鄭王朝〉，頁 171。

28 相關討論可參見吳建昇，〈臺江浮覆以前的洲仔尾地區〉，《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7 期（2008 年 4 月），頁 193-231。曾囑淑，〈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臺灣文獻》，72 卷 3 期（2021 年 9 月），頁 7-46。

29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的連續性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頁 228-230。

30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76、379。

31 夏琳，《閩海紀要》（臺灣文獻叢刊第 1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66。

32 杜臻，《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54。

33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2004 年；1689 年原刊），頁 254。

碑」。³⁴ 鄭經似也曾到訪此地。³⁵ 李在世時，即與住僧禮誦經文為娛，自號李菩薩。從季麒光為準提庵募修所寫的文章〈募修準提菴小引〉中，其稱聚集在此的僧人，一開始是一位叫做宗演的僧侶，在此處結草，後來有信徒將其擴大。³⁶ 李茂春逝世後葬於新昌里，居所則轉成為佛室。肅靜清幽的佛寺是明清文人出遊造訪的目標之一，該地又位於城南鄰近處，並近溪仔墘溪（竹溪），隨宗教設施的設立，漸引發轉為遊憩標的。

這類宗教場域，尚包括竹溪寺、彌陀室，以及龍湖巖。竹溪寺位於竹溪旁，法華寺以南，從清初的紀錄來看，「林木蒼鬱，溪徑紆迴」，係有景致。³⁷ 彌陀室因早期規模較小，故稱為「室」。位於府治附郭之東，興建於鄭氏時期。庭宇幽靜，佛像莊嚴，且傍植檳篁，名花芬馥，可供遊詠。³⁸ 而距離府城較遠、位於當時諸羅縣開化里（今臺南市六甲區），由陳永華所建的龍湖巖，景致優美，《蔣志》即稱：「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左右列植楊柳、緋桃，亭內則碧蓮浮水，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眾木榮芬，晚山入畫，真巖居之勝地也。」儼然一修行勝地。³⁹ 這些宗教場域，在清初的紀錄當中都不免提及其寺內景致，這似也意味著延續著明清佛寺與文人間的關連，除禮佛參拜外，更是一個出遊的標的空間。

綜上所述，鄭氏時期，於府城內外，已有數處園林與遊憩場所。當政權交替之際，若無遭到戰火破壞或對前朝設施政策下的刻意毀壞，將可是接任的官員文士可資運用的場域。

3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頁 161-162。惟陳永華所贈原碑業已不存，後由陳氏子孫於嘉慶年間重刻。

35 鄭經，《東壁樓集》，頁 56。

36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年），頁 381-382。

37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220。竹溪寺是否於鄭氏時期建立，並是否為臺灣第一座佛寺，仍有諸多討論。可參見盧嘉興，〈竹溪寺沿革誌要〉，《臺南文化》，2 期（1976 年 12 月），頁 68-72。楊惠南，〈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臺灣文獻》，53 卷 2 期（2002 年 6 月），頁 99-112。釋自憲，〈府城竹溪寺創建年代之考察〉，《世界宗教學刊》，19 期（2012 年 6 月），頁 167-197。

38 盧嘉興，〈再談臺南古剎彌陀寺〉，《臺灣研究彙集》，12 期（1972 年 8 月），頁 17-18。

39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08。

三、勝朝的地方領導者

若是在江南、徽州等地，主導園林修建者自是當地的仕紳、文人與富商等。但臺地初入大清版圖時，對於鄭氏的官員採取盡行遷回內地的政策，即便有少部分仕紳（如沈光文）仍留在島內，並與新來的官員交誼往來，但基本上這些文人並沒有經營園林空間。面對這些前朝遺留下的「殘山剩水」，如何「春風又綠江南岸」，自是落於清初被中央派駐來臺（或是被施琅推薦）、填補權力空缺的內地官員身上。

清代派免官員採籍貫迴避政策，以防止官吏徇私。而地區迴避並對公務員任職地區進行一定的限制，不得在本籍或原籍擔任公職，即所謂的「避鄉」、「避籍」，避免親屬關係對工作的干擾。⁴⁰ 故渡海來臺的各級官員自非本地人士，連帶往往在臺原無居所，並無自屬家園可供長期經營。加以官員的家屬必須留置大陸，並有原則三年的任期限制。這些措施意味著官員往往是單身赴任，連帶使其少有於臺灣添置房產，而是多居住於附屬官舍或營房內。相對清領以前因貿易或流寓前來的人員，有著更多且更嚴格的限制。

故官員如欲在有限的任職年限內修建園林或遊憩空間，除了賞遊自然盛景外，可能的發展走向便可能以官衙（無論是新築或改建自前朝遺留者）為重心，在其內或周遭興建以官紳為主要使用者的官署園林，或亭、臺、書屋等可短期完成的小型休閒設施，與江南等地由在地仕紳興築代表性林園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前朝所留下的諸多園林、幽靜空間，在原擁有者已被迫遷離的情況下，也是後續的領導階層可以重新改造的場域

叁、衙署的行政與休憩空間建置

隨著清帝國展開統治，治理的文武官員陸續進駐臺灣。在公餘之際，透過賞遊、文會、接迎、送別等契機，相互往來交誼，亦是在臺生活的一部份。而除了賞遊開放的自然盛景，在公署內外營建園林與休憩空間，甚至打造一

40 魏秀梅，〈清代任官之籍貫迴避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期（1989年6月），頁1-36。

個專屬於官吏與文士的官有園林，以作為接待訪客或自娛遊玩之空間，成為在臺任職的遂行項目之一。其成果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官衙內的小型休憩設施，二、衙署內的園林，三、獨立園林。

一、官衙內的小型休憩設施

官員在臺任期內，往往暫居於衙署內或鄰近的附屬官邸中。這樣前為公堂、後為官邸（或左右之分）的模式，使得衙屬成為其主要活動場域。在「前仕後隱」間，就近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休憩天地，便成為最便捷的方式。

隨著臺灣隸清，相關官衙營舍亦隨之逐步新砌築造，有相當比例係將鄭氏遺留的建物撥充官署使用。如分巡臺灣廈門道公署為「在西定坊，西向；偽時舊宅也」，在東安坊的臺灣府署則係「天興州舊署」，郡學宮則是「自偽鄭氏始也，在寧南坊，南向。國朝開闢以來，仍其舊制」，當時位在東安坊的縣署也是「偽時舊宅也」。⁴¹ 且不只是文職衙門，武備設施，如臺鎮公署、鎮標中營公署、鎮標左營公署、鎮標右營公署等，皆是沿用鄭氏時期的建築。⁴²

而諸多公署內，有著大小不一的休閒空間。即便如鳳山縣設在府城內的儒學公館，都有著「茅亭小屋於署後，為講學之地，蒔花木以供清玩」。⁴³ 另有些武官並有自己的花亭。⁴⁴ 在府城內，長期位於同處而未搬遷者之公署，具代表性者莫過於道署及府署。道府兩署對於園林與休憩空間的營造進程與規模有所不同，以下先行分析規模較小的府署。

臺灣府知府為實際執行臺地政務的代表文官，位於東安坊的府署亦是重要的官紳交會場所。公署內部配置為「南向。前有大堂、後為川堂，為偽天興州舊署。由川堂轉而西北，為內宅；偽遺舊宅也。」⁴⁵ 首任知府、出身

41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20 年原刊），頁 73、78。

42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72。

43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720 原刊），頁 14。

44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219。

45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73、78。

奉天錦州的蔣毓英在上任後，題匾「開疆立本」，使即便是入用前朝舊宅，亦能「志新造也」。⁴⁶ 蔣並添設了傳遞自身意念的空間—安拙堂。根據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行，第三任分巡臺廈道高拱乾補纂新成的《臺灣府志》（簡稱「高志」）內〈蔣郡守傳〉所稱：蔣毓英「嘗於官舍之旁，構一草堂，顏曰『安拙』。人謂『公之才，當羽檄交馳時應之，綽有餘地；今顧自安於拙，何也』？公曰：『才以理繁劇，而拙所以安新附也』。」⁴⁷ 這個建築曰「堂」，性質應偏向是一個處理公務的空間，但從蔣毓英回答旁人探詢命名時述說出來自身的心念，安拙堂反而像是蔣的一個私有休閒天地。

與蔣毓英同時期的諸羅縣知縣季麒光，曾有契機到府署洽公甚至於聚會，並且入安拙堂一遊。在季的一首題為〈太守蔣公安拙堂成疊石作山斯菴以詩紀勝依韻賦呈〉詩作，就描繪了這個草堂的樣貌。

園開綠野清復幽，亭下小山連數尺。旋轉曲折丘壑新，盤根蠹翠窮搜擘。
豈是靈巖夜飛來，豈是永康松雨積。公餘捫倚飛鳥間，青天明月高情適。
洞門乍轉暮雲紅，池上遙看涼路白。堂前烟影修竹平，堂後緣堦流水窄。
目放長風歌嘯舒，杯香花裏開胸膈。晴鳩啼樹向簾櫳，海燕掠沙棲屋脊。
顏題安拙自休休，左右樽彝羅典籍。⁴⁸

另一首〈草堂歌〉對於安拙堂的描述，可提供觀者對於該堂樣貌的一些印象：

牒判庭空飛鳥過，官閒正喜看雲坐。欲識孤臣萬里心，草堂小築堪容臥。
剪茅刈竹結構工，曲廊小榭引秋風。對酒花看月下白，呼童樹插禽來紅。
蕭蕭蠹隊簷簷竹，綠雲深鎖籬邊屋。數聲清管落青蕉，幾數繁花啣野鹿。
太守治郡同治堂，經營規畫周如防。檐帷影動鄭公雨，鈴閣春融召伯棠。
……坐中有客推龍門，珊瑚迸碎凌高軒。立談坐笑佐畫諾，興酣瀟灑空

46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9。

47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60。

48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195-196。

罍樽。風流三徑開丹壑，疎枝細草供酬酢。曾紀黃州舊竹樓，更譔杜老
瀼西閣。……從來吏議之公在，道路東寧今日歌，何慕草堂今名自，此
乘不朽千年共。⁴⁹

雖沒有直接說出描繪的地方是安拙堂，但詩句內言及「暨陽太守妙經
綸，清源八載治有神」、「太守治郡如治堂」等語。而季麒光在蔣毓英《臺
灣府志》（簡稱「蔣志」）內的〈臺灣誌序〉即稱「臺灣既入版圖，例得附
載。但洪荒初闢，文獻無徵，太守暨陽蔣公招耆老、及儒生……等語」⁵⁰，
即可知〈草堂歌〉所描述的地點，便是暨陽太守蔣毓英所修築的草堂。

綜合前述二詩，大概可以推敲出部分安拙堂的面貌。該堂係以竹材搭建
結構，上鋪茅草，並不是一個以磚瓦興建的穩固性建築，規模應該也不會太
大。臺灣有多種竹，蔣志內便列了八種，其中的荊竹、籬仔竹可作圍籬。⁵¹
而以茅草取材容易，並有一定遮風避雨的效果，以之作屋頂是開墾初期常見
的做法。⁵²而從「曲廊小榭」之詞來推敲，可能也有廊道跟附屬建築以供通
行與賞幽。除了欣賞周遭的蕉、花等植物，安拙堂所在的位置並可欣賞周遭
景致。因府署所在的東安坊較周遭略高，北側並有德慶溪迂迴穿越，臨溪處
落差甚大且地形高低起伏。「亭下小山連數尺」、「堂後緣堦流水窄」等詩
句，正反映出該地自成一格的特色。故安拙堂雖名為「堂」，但性質比較類
似一個府署內後花園的休閒場地，可作為蔣毓英調劑身心，或供蔣及其同僚
們進行交誼及接待賓客場所。

但以「剪茅刈竹」工法所成的草堂可能難以長期屹立，故第二任的知府
吳國柱，於任內也修築了一個草亭，蒔花草於其中，應同是類似後花園內小
型建築的性質。⁵³既稱亭而非堂，應該不是安拙堂。而康熙 59 年（1720）完

49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203-204。

50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25。

51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76。

52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82。

53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9。

成的《臺灣縣志》內則提及，府署內有建草亭一座，作為校射之所。⁵⁴ 這個草亭是為了校射之用，與吳國柱所建的草亭顯然又是不同，且吳知府的草亭能否撐過三十年間的風雨侵襲也著實難以想像。但既然可以作為比試射技和武藝切磋的場地，顯示草亭旁有相當的空間可使用。曾錯將天興州署誤認為承天府署所在地的連橫（1878—1936）便指出：「承天府【應為天興州】在東安坊，鄭氏所建，其後改為臺灣府，規模之大，冠於全郡。」⁵⁵ 由於東安坊相對於臺廈道署、海防廳署所在開發較早、位於海濱的西定坊，有著較空曠的地域。或因如此，天興州署在初始興建時便擁有寬廣之地，連帶使得後繼的臺灣府署有增建需求時可以有更多運用的空間，包括用以興建簡易休閒空間。

而射箭等武藝活動，除了作為維持官員體能的目的之外，也是聚會的名義之一。這類射亭可作為「蓋射畢停驂處也」⁵⁶，即暫棲場所。另如康熙 44 年（1705）的海防同知孫元衡，就曾做〈病中〉一詩云：「芳樽獨負忘歸子（時諸君有射圃之約），良藥全憑抱節君（醫方主竹瀝）。莫道前軒花有徑，未能著屐已離群。」⁵⁷ 對於因病錯過有射圃之約有些感嘆，顯然本來是與同僚們有約於該處。有時射圃本身更成為勝景，如乾隆年間的右營遊擊署內，即因刺桐樹「列植以百計，因以名園。」⁵⁸

另值得注意的是，一度被列為臺灣府八景之一的府署「四合仙梁」，後被改列為臺灣縣八景之一、並稱為「郡圃榕梁」的古榕，是府署內的指標勝景，府署名園「鴻指園」的興修與其有若干關聯。⁵⁹ 但在康熙年間的幾份紀錄當中皆無提及，或反映出當時古榕應仍未成規模。

54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73。

55 連橫，《雅堂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241。

56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2。

57 孫元衡，《赤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77。

58 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1772 年原著），頁 33。

59 相關討論可參見蔡承豪，〈清代臺灣府署「鴻指園」之研究〉，頁 151-154。

二、衙署內的園林

相對於府署內的小型休閒設施，作為臺地最高文官的衙門一道署，其內則是營造了一個整體的園林—寓望園。而後續更有被列為臺灣八景的「斐亭」，「澄臺」相繼建立。

（一）周昌的寓望園與季麒光的〈寓望園記〉

道署是臺地的權力中心之一，又位於濱海處，是府治之中離海最近的公署。而對於來自內地省份的官員，登高觀海是來臺的主要特殊經驗之一。⁶⁰於公於私，道署綜合了一個興建大型聚會空間的背景條件。而首任臺廈道、正藍旗人周昌即作為興建官署園林的發動者，營造的規模並遠較蔣毓英搭建安拙堂為巨。

周昌的任期為康熙 23 年（1684）至 25 年（1686），根據由季麒光所撰的〈寓望園記〉中，詳細說明了周昌建園目的，啟動的時程及園內各項設施等。根據所述，此園係「公治臺一載，政治之暇，就署後築小室」而始，故係康熙 24 年（1685）所建。而興建的目的，係因臺地「無樓臺觀宇之勝」，自然景致亦屬荒雜，故「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遂著手設置。取名「寓望」，取左史「璫有寓望」之意，意旨在邊境設置以備瞭望、迎送的館舍。就大清的觀點而言，臺灣是一個新入版圖的邊區，這樣的取名正符合周昌前來上任的意涵，「則燕閒寂處，已不忘周防捍固之意」，這個名稱或也可隱含著此園並非單純用以逸樂。⁶¹

而寓望園的佈局，造園主認為：

園不依山則不古，園不依水則不靈，園不依喬枝古木，則不符迴而盤曲。蓋以入勝者，未有能成趣者也。若就方區員幅以寫其胸中之丘壑，其妙在於借景，而不在於造景。使觀者于此骋望尋探，應接不暇，儼若登高臨深，倚柯蔭，而不知其為亭前之疊石，臺下之繁花。此非園之能娛人，而位置結構者，能引人以入勝也。⁶²

60 李知灝，〈權力、視域與臺江海面的交疊—清代臺灣府城官紳「登臺觀海」詩作中的人地感興〉，《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0 期（2010 年 4 月），頁 9-43。

61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7。

62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7。

每個造園主，大體有其築園理念，並藉由選勝、借景、掇山、理水、建築、花木、空間與曲隔等各式造園手法轉化表達。如何適度拿捏各種表達手法以營造原主所欲表達者，便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明清園林由「壺中天地」進一步發展為「芥子納須彌」，在建築特色表現出三個特點：1. 造園手法的窮極變化：於有限空間中對細節進行翻新巧緻。2. 造園藝術的程式化：在經驗的積累下，陸續出現了造園藝術的理論專書，使建築可大量複製。3. 造園風格的追新逐異與炫奇鬥巧：園林本欲追求和諧的自然景象，所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然在爭奇鬥豔下，然隨刻意製作，反而喪失自然風味等。批判了刻意營造的一面。⁶³而周昌所強調者，亦是在有限空間中的發揮，藉由「借景」而非刻意營造來使觀者自然入勝，似也排斥了刻意過度營造的手法。宛如呼應著明清文人造景時所強調「雖由人作，宛如天開」，在小巧精緻中，呈現有若自然的意境。⁶⁴但這可能亦有是配合現實下的作為，一方面道署鄰近海濱，即有自然景致可資觀賞。另一方面，當時臺地可能尚無足夠的建築資源及人才，加以營造經費有限，且在任期有限的情況下不易投注大量資源，因而採行了借景為主的方式。

不過在園中，周昌仍布置了多個設施，包括一間附有前庭的小室，三座園亭：寓望亭、環翠亭（乾坤一艸亭）、君子亭，射圃，以及一座樓臺。小室應是主要的交誼與聚會空間，內「置圖史尊彝，瑯玕滿壁，珍賞盈几」。⁶⁵而前庭則置花竹、水盆等，盆內畜魚且有拳石妝點；一般來說，園林離不開水池，或許短期內尚無法挖鑿出水池，故即以水盆替代，增添園內水景。在財力、物力所及的園林中，常可見到各種形類的收藏的刻意收藏，其中有園景中之奇石、奇花與異木等自然界之特殊物類，亦有其他人文博物圖書收藏，賦予了文人園林具體的人文價值，使園林有時性質類似了博物館。⁶⁶

63 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64 張淑嫻，《明清文人園林藝術》（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年），頁181-183。

65 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頁357。

66 張婉真，〈試談中國園林的博物館概念〉，《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7卷8期（1997年11月），頁63-70。

除了小室，園內並有幾座園亭。首先是位於西園南墅者，即取名「寓望」，是與小室搭配、最主要的憩亭。接下來的環翠亭、又稱乾坤一艸亭，強調係用草搭成。環翠亭「蕉陰竹韻依繞左右，當風來奏響」，另名乾坤一艸亭則取杜甫（712 — 770）寓居四川之意，在「一亭之中，足以傲羲皇，排腎葛，齊去留得失之觀」。接著，便登上樓臺，進行可謂是賞遊寓望園的重點儀式—觀海。觀者在方臺上的樓內，「御遙天吞，大海浩浩湯湯，杳不知其涯際。天空海闊，而安平勝狀如在几席。」賞畢後，「自樓而下，人在蕉石中行，徑幽而折。稍西一亭，為公觀射處，以『君子』名之，有取于無爭之義也。」⁶⁷從小室、園亭、樓臺再回到觀射之亭，於這個被建構出來的異質空間內，穿梭於自然景致與人工設備間，即似從進入賞遊後，再回到正務之所的行旅。

季麒光讚頌周昌在閒暇之餘，將蠻荒之地築出「標奇天外」的寓望園，是為後人所不能及，甚至可比擬柳宗元（773—819）被貶時寫出《永州八記》之山水散文。而自己撰寫此文，則有如「歐陽文忠為韓魏公記畫錦堂」，更藉此暗喻周昌有著清風亮節人品。⁶⁸周昌在上任前，即被舉報有貪污之嫌因而接受調查中，但在攻臺主帥施琅（1621 — 1696）的薦舉下，康熙皇帝仍然裁示讓其擔任臺廈道。季麒光如此稱頌，應當甚能讓這位上司頗感欣慰。在官吏建園的同時，為文創作則可傳遞園主之志，除建構了園林書寫佳作，並圖傳世流芳。兩者之間，可謂移植並展顯了如同江南文人園林的精神。而周昌除了創建寓望園，並於隔年另修築了「北園」（詳下節），可謂是清初園林興築的重要推手。

（二）斐亭與澄臺

官署園林的最大挑戰在於官員因有定制任期，接任者不一定有力維護，且臺灣又時有颱風、豪雨與地震侵襲。故即便是位於道署內的寓望園，要如何長期維持便是一大課題。在康熙年間的多部臺灣方志中，寓望園的紀錄幾

67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7。

68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7-358。

完全消失，要至乾隆年間方重新追記其已荒廢的情況。會是如此，除寓望園業已毀損外，更可能的原因係來自於其他景勝的取代。

高拱乾在康熙 31 年（1692），由泉州府知府陞補臺廈道，任內也投入園林建設，在園林書寫的流傳上，更有著更全面性的運作。先是在康熙 32 年（1693），高拱乾於道署後方興建了斐亭，並在亭之左建臺曰澄臺。此二者即是世稱「斐亭聽濤」、「澄臺觀海」的府治八景之二，高拱乾並作〈澄臺記〉來說明亭臺之源由。由於興築樓臺常被世人認為是奢華浪費之事，故高先解釋，適當的休閒對於「耳日常慮壅蔽，心志每多鬱陶」的官吏而言是有所助益。但官邸位於市廛之中，去山遠甚，官吏實難一觀山水景致，故高拱乾「捐俸鳩工，略庀小亭於署後，以為對客之地，環繞以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築臺於亭之左隅，覺滄渤島嶼之勝，盡在登臨襟帶之間，復名之曰『澄』」。除了在海外亦得宣揚德化，更讓登客「不為俗累、不為物蔽，散懷澄慮，盡釋其絕域棲遲之歎，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故此二處比之蘇軾（1037－1101）筆下的凌虛臺、超然臺，毫不遜色。⁶⁹

就〈澄臺記〉的描述，斐亭與澄臺的位置就在道署後方，即寓望園的範圍內。在大自然的挑戰下，周昌興建的草堂推想早已不存，斐亭應是完全新築者。但澄臺是否即是在寓望園中的方臺位置呢？由於遠眺位置有限，或有可能仍在同一位置，但建築則是重修。但〈澄臺記〉卻無一字提及，顯示新的造園主獨佔了舊有地的詮釋權。這也反映了官署園林的特色之一，前後來到同一機構任職的官員，並不一定是原有設施的維護者，亦有可能以新主之姿，對區隔於公務的異質空間進行重新的創造與書寫。

高拱乾並將〈澄臺記〉中收錄至《高志》中。高志相較於蔣志，規模較大，流傳也較廣。相對於〈寓望園記〉僅少數方志有所節錄⁷⁰，〈澄臺記〉則被廣泛收錄於各版本之府志及縣志中。此外，隨著進入清朝版圖後，官宦人士也將宋代以來選定「八景」、並為之圖文的風氣帶來臺地。最早可見於

69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70。

7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97-98。

季麒光的書齋八景，《高志》中更轉化為臺灣八景，包括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斐亭聽濤、澄臺觀海。⁷¹八景並非單獨只以景物存在，它還會帶動詩、文、畫等以「八景景物」為主題的文藝創作與圖像的產生，為之烘托。⁷²斐亭與澄臺列名八景，除使此二處多次被重修外，並不斷被吟頌、傳唱與書寫。文藝書寫與活動，正是文人化園林的特徵。⁷³斐亭與澄臺即便是由官員所修建，然官員群係屬明清文士的一員，故援用了聚會與書寫方式為其生色。到了乾隆年間，更在府志內出現了八景木刻版畫予以具象化。⁷⁴

故續任者處理道署後園林時，即便斐亭因天災、戰亂等因素業已不存，仍致力於復其舊觀。如乾隆 9 年（1744），臺灣道莊年重修斐亭即考訂其舊址，出俸餘築草亭於其上，並留有〈重葺斐亭記〉；⁷⁵而莊年更將自著命名為《澄臺集》，可見其對斐亭、澄臺的重視。⁷⁶

澄臺與斐亭透過建置者的運作，取代了先創的寓望園，成為道署園林最代表性的標誌，也是履臺官員聚會、造訪之重要標的。而寓望園僅能透過首任巡視臺灣御史黃叔璥著《臺海使槎錄》內的「昌於道署後築小園，名『寓望』，蓋取左史量有寓望之言；麒光亦有記。」⁷⁷短短數言，留下雪泥鴻爪。

後道署內少數新增的設施，則有豐亭，係於乾隆 5 年（1740）由巡道劉良璧於署後東南隅創建，但規模不詳。⁷⁸

71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66。

72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年）。王建國，〈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頁 230-244。

73 巫仁恕，〈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1 期（2008 年 9 月），頁 21。

74 蕭瓊瑞認為巡視臺灣御史六十七是八景圖出現的主要倡導與指示者。參見蕭瓊瑞，《懷鄉與認同》，頁 87-91。

75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47 年原刊），頁 692。

76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573。

77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1736 年原刊），頁 51。

78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61。

（三）獨立園林：北園

除了依附於府署內的園林及休憩設施外，興建一較遠離市廛的獨立園林空間，除在移動間沿途觀遊外，更可較不受干擾。如此的地域將可形成一隔絕於俗世雜務、於遊憩文會間放下彼此身份差異、有別於日常的異質空間。

原屬寧靖王朱術桂的「一元子園」，應頗有規模，或可為興造獨立園林的目標，然後來改建成為宗教場域。⁷⁹但鄭氏所遺留的北園別館情況則不同，在清軍接手後，北園別館似尚未被改建利用。而其距離府城不遠，且建成至清朝接手統治不過三年，設備理應仍完善，可資利用。但在政權交替之際，誰可以掌握北園別館的所有權，便是改建的關鍵。李文良的研究即指出，清初由於戰亂和政府態度曖昧，使臺灣田園的接收與管理牽涉到複雜的文武官員權力競逐與私地侵占等問題。⁸⁰而北園別館轉換為北園，期間細節目前無法得知，但在康熙 25 年，也就是周昌在臺任職的最後一年，他在此建立起「北園」，變成一個獨立園林，使其可與同僚在此宴樂聚會。⁸¹

描繪經周昌整理後北園樣貌最詳細者，莫過於季麒光代筆的〈北園記〉，以及季麒光自身遊歷後所寫的〈秋夜遊北園記〉。前者描述建園的背景與園內的設施，後者則是康熙 25 年 8 月 16 日，即中秋節的後一天，一行官員到北園熱鬧賞玩的紀錄。

近八百言的〈北園記〉一開始即稱「北園者何？鄭氏舊業也。」明白點出此地乃是鄭氏舊宅。而北園雖在平壤之地，「無丘豁亭樹曲折凌峻之致」，但周遭為竹林與綠槎所環繞，一片蓊鬱。而穿越茂蔭遮蔽的小徑推開竹扉入園，則蔚為另一天地。周昌在內佈置了多項設施，其以園內的池塘為中心，先是於池旁築有前後各三楹的小室，臨塘者設計為中敞，是主要聚會的場所，季麒光特將之命名為「致徹」。園主與訪客可在室外就「屋之樹以欄楯，

79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07。吳振臣，《閩遊偶記》，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年），頁 19。

80 李文良，〈民田與墾墾制度：清初臺灣田園的接收與管理〉，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頁 27-56。

81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51。

或倚或坐，可憑以臨眺後」，室內則「設几席列琴書，可觴可咏〔詠〕，同心四五人雜坐箕踞，啜茗深談」。⁸²而為免於繞行之苦，池上則架設橋梁，並做憑欄，如此便可於橋上觀池內游魚。而橋下更置二船舫助遊，「如秦淮燈篷之式，花明月麗，懸燈兩簷，命童子蕩輕橈，鼓槳擊楫，唱採蓮諸曲。此時身在舟中，則如響鈞天，泛瀟湘紅雨。若從橋臺望之，又是白烟素火，放百道流星風纏煜煜也。」⁸³

在池與主室的周遭，周昌尚佈置了多個遊憩設施。就其描述，在主室的北邊，開始進入水的領域，有小橋、長堤與層臺，沿途漫遊，在有無間可聽到從塘中溢漫的流水活活作聲，雨後聽之更有深感。而層臺有兩丈高，除可俯瞰全園，透過樹梢，「東山牙列若拱柱笏，而大海烟雲近在眇睫可掬」，是園中最佳的觀景點。⁸⁴而從前述描述，可推斷該園距海不遠，且東有山、北有水，主室應為南向、即望向府城之方位。在池塘之東，因有棄地，周昌遂命人除草後廣植桃花，至花開時節美不勝收。另結草作一新廬，並編竹為徑，以與主室相通。而稍南再做一草亭，環覆竹樹。透過前述佈置，共構出一副江南韻語。⁸⁵

部分設施可能係承襲自原有者，但季麒光在代筆時基本上只點出新造者。而周昌對於此園顯然甚為自豪，除了委請季麒光作記外，更將之繪圖存影。最後更自誇，「不可謂臺灣之有北園，非自余始也。」⁸⁶不過北園之圖現在已難一見，倒是〈北園記〉經摘錄收錄在《臺海使槎錄》內。⁸⁷雖只有數十字，但已較〈寓望園記〉為多，並成為後世描述北園者必引用的材料，讓此名園不致遺忘，並顯示出園林書寫的影響力。

周昌既以北園為傲，自樂於在該處舉辦聚會，雖相較於就在署後的寓望

82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8。

83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9。

84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8。

85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9。

86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9。

87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51。

園，移動至北園需花費較長的時程，但獨立且有池景可供賞完的園林，更是一個與塵世感覺的獨立空間。另一篇〈秋夜遊北園記〉，即是描述康熙 25 年的 8 月既望（16 日），季麒光與周昌、蔣毓英、宰調元（鎮標右營遊擊）、韓又琦（鎮標左營遊擊）、楊芳聲（鳳山知縣）等文武官員前往北園遊玩的經歷。

該次組合包含了臺廈道、臺灣知府、鳳山知縣、諸羅知縣，及臺灣鎮的左營游擊與右營游擊等文武官員，陣仗甚大。而當天為中秋節過後一日，圓月仍明亮懸空，如此快意出遊，季麒光不免再發聯想，先以宋朝王琪進詩提醒太平宰相晏殊（991 — 1055）後賞月共飲的軼事來比擬。接著，季麒光先是描述了北園的舊貌：

北園僻介荒墟，無曲樓迴榭之觀，也無烟峯時磴之奇，也無繁花細艸幽房折徑之勝也。中有小池，一亭突倚其上，斗室三楹，與亭相接，週遭插竹作圍，在深篁叢綠之中。傍有高臺，方十笏許，登之可以望海。⁸⁸

綜合上述二文來看，當周昌改造北園別館時，其內設施仍留有勘供遊憩的設施與水池，後陸續增建小室、草廬、草亭、橋梁等，並種植花木。如此新舊並陳，方可在任期中建造出一個比寓望園更加完善的園林。

而這次的聚會相當風雅，明月照映在水塘上，水面波紋盪漾著月光與週遭竹木翠綠。除了景緻，周昌與韓又琦更各自帶了戲班，

搬演裸劇，吳歛越調，細管低絃，清澈之音，過雲裂石。己則操瑟調箏，為并涼悲楚之歌，夏令歡人之極酸切作快。夕陽既隱，相與乘舟弄月，蕩槳迎風，命諸子弟衣宮衣，唱採蓮競渡之曲。雖方塘數畝，而往來旋折如泛錦帆之棹，不啻深在桃源渡口。⁸⁹

88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59-360。

89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60。

到了二鼓（亥時，晚上 9 點至 11 點），一行人登高臺遙觀海景與重山，並賞街市鱗鱗、齒齒俱交之景。到了四更（丑時，凌晨 1 點至 3 點），與會者陸續由臺下過小橋，聽溪水泊泊在石礪中。而整夜園林宴飲，彷彿將江南韻味搬移到臺灣來。⁹⁰

這樣的聚會並不是只有一次，至少季麒光在康熙 26 年離臺前，周昌與其他文武同僚聚集在北園為其送別，季並留下了一首〈五月望日憲副周公招同文武諸君集于北園余將行得與其勝賦此誌謝并呈令弟郁文〉五言排律。⁹¹而周昌雖然於康熙 25 年解任，但接任的王效宗（？—1691）要至隔年才上任。⁹²故康熙 26 年時周昌應仍在臺，方有此聚會，季麒光也才能稱「猶喜陪芳讌，歡遊此再逢。」⁹³但這說不定也是周昌使用北園與寓望園之最後短暫時光了。

肆、宗教場域的整建與設立

除了園林，宗教場域隨著明清時期的旅遊風氣，讓本就與文士、官吏有著互動往來、並接受外來者參訪的佛寺，更加成為遊憩標的。在臺灣，雖鄭氏時期已有若干佛寺建立，但規模有限，與內地省分難以相比，且地方仕紳階級也尚未成形。這似也導致著代表國家力量的官員有更強的主導性介入宗教場域的整建與設立，呈現了一種與江南有異的特殊廟宇園林景況。而就實際成果來看，可分為大型改建、小幅增修、新建與未積極干涉者。

一、大型改建

對於宗教場域的大型改建，係對於就有場域的大幅更動，最明顯的個案，即是將北園改造為海會寺，以及對於法華寺的命名與增築。

90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360。

91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286。

92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102。

93 季麒光，《荅洲詩文稿》，頁 286。

（一）從北園到海會寺

隨著周昌去職，寓望園的地標被斐亭、澄臺所取代，另一個北園則更大幅度的改變身份，於康熙 29 年（1690）被「改為佛寺，名『海會』；並置寺產，以為常住之業」，成為官營佛寺。⁹⁴

1. 轉為佛寺的角力

這樣的轉變，過往的研究通常歸納為這個巨大轉變的主導者，即第二任的臺廈道王效宗與也是第二任的臺灣總鎮王化行（1643—1710），這兩位同時分別是臺地最高的文武官員，其宣稱因「臺灣版圖新闢，德教覃敷，神人胥慶，典章無闕。惟少一梵剎」，方設立海會寺。⁹⁵文武要員以「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林，朝煙暮靄。諸同人瞻仰於斯，僉曰：是三寶地，何不就此立寺招僧迦以修勝果，亦盛世之無疆福田也」為由，又正好遇有自幼出家的僧人志中，從江西來臺，聽到消息後願募緣來完成。於是鎮署同人各捐俸，自康熙 29 年 8 月 7 日動工修葺，補修門楹，重整垣宇，裝塑佛像，至 30 年（1691）4 月 8 日完成，並命名為稱海會寺。⁹⁶但周昌方於前數年於內大舉歡宴的場所，卻在三年間就變成「廢舍」，除非是有遇到方志未載的大型地震或強颱，否則不太能如乾隆 40 年（1775）就任臺灣知府的蔣元樞（1739—1781）所稱的「鄭氏既滅，臺館荒蕪」來形容清初的北園。⁹⁷故由這樣的組合具銜決定，背後應有重大緣故。

當時臺灣並非沒有佛寺，除了彌陀室與法華寺這兩座有較久背景者外，左營守備孟大志也才在康熙 27 年（1688）於東安坊建了黃蘗寺。⁹⁸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在於周昌去職，使北園的歸屬似乎成為必須協調的場域。誠如研究

94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臺灣文獻叢刊第 28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年），頁 7。

95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470。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1979 年），頁 281-282。

96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470。

97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7。

98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07。該寺約位於臺南大北門外，今臺南二中南旁。

者指出，海會寺的興建，係以名為興建佛寺、實則控制寺產土地的策略。因海會寺擁有清初臺灣眾佛寺中最多的寺產，而這些財產，很可能是接收自鄭氏家族在洲仔尾的產業，且洲仔尾位於陸路與港口的交通要道，並有官營鹽田，地位重要。但總鎮署與教場位在府城北境，北園一帶又屬於左營負責的範圍，故文官系統如何處理此地，著實需費思量。⁹⁹

為了避免鄭氏舊產被征臺武官佔為蔭田的可能，且王效宗在康熙 29 年，其實也曾改建了一間廟宇，將天后宮後方的關帝廳（寧靖王並曾書匾「古今一人」）修建為武廟。王效宗可能對於宗教有某種虔誠或想法，故在同一年內，也將修建廟宇的模式用在北園，採用了名為興建佛寺、實則控制寺產土地的策略。

廟宇主體建成後，志中禪師再持續募緣鑄銅鐘，由於適逢坐關由代住持僧的弟子福宗禪師籌畫，康熙 34 年（1695）完成。鐘銘同時也是志中和尚的出關偈：「獨坐釘關給善緣，募鐘立願利人天；一聲擊出無邊界，同種功德億萬年」，係由鳳山縣知事閔達（達）所作。而從鐘上鐫銘捐獻人名，包括了臺廈道高拱乾，三任臺灣總鎮兵：王化行、穆維雍及王國興。臺灣府知府吳國柱、臺灣府同知齊體物、諸羅縣知縣張尹、臺灣經歷司尹復、臺灣縣縣丞張元英、新港司巡檢孫元禮、加里興巡檢陳國治、諸羅縣典史嚴時泰、臺協副將衛聖疇、北路營參將呂得勝，其他各營遊擊 8 人、守備 25 人、總鎮府內 31 人等。¹⁰⁰ 兼含臺地的文武各要員，可見海會寺的特殊身分。

2. 佛寺與休閒

海會寺除了最主要的修行與禮佛功能，對於官吏而言，則更是多元運用的場域。如作為官建佛寺，也成為官方運用作民生祈禱之用的場所。府城一帶的祈雨地點，其一便在海會寺。¹⁰¹

99 陳至祈，〈園林與佛寺〉，頁 83-106。

100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82-283。

10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二十四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818。

而至明代中葉，因寺院具有寧靜、安詳景致，並得住宿，且尚可與僧侶進行互動，甚至有珍貴的古物收藏等等，已成為官員文士的旅遊目標之一。¹⁰² 海會寺雖尚無悠久歷史，但既改建於北園，內應仍有若干景致可供賞遊，且「距邑治四、五里許」，當日可往返。另在海會寺與府城間，臺廈道陳瓚（1656－1718）於康熙 50 年（1711）擇地鳩工建萬壽亭於東郊永康里之北，至萬壽亭參與祭典後，官員們另可至「佛像最勝，住僧雲集焉」海會寺遊憩，並與僧人交誼。如第四代住持釋澄聲，字石峯，便被稱為「擅書畫，好詠吟，尤善手談。有司聞其名，多就訪之。時或苦旱，延以祈雨，屢驗。」¹⁰³

藉由節慶前往出遊，也成為官紳造訪海會寺的契機。在秋高氣爽的重陽節時分，「各備酒肴，游於寺中，如海會寺、法華寺及小西天皆是也。是之謂『登高會』。」¹⁰⁴ 至乾隆初年，登高會更演化為「童子製風箏如鳶、如寶幢、如八卦河洛圖，競於高原因風送之，以高下為勝負；夜或繫燈其上，遠望若炯炯巨星。」¹⁰⁵

既成為重要探訪場所，海會寺逐漸成為官紳文士書寫的對象，相關詩作漸豐。如漢軍正黃旗人齊體物，他康熙 30 年由漳州海防同知調任臺灣府海防捕盜同知，並參與了前述海會寺銅鐘的捐贈。其留下的第一首詩可能是目前所見最早海會寺的詩作〈海會寺〉：「冷月橫斜弔子規，當年黃幄爾徒為？梁塵尚逐梵音起，幡影猶疑舞袖垂。風雨有時聞響屨，草花何用長胭脂！是空是色渾閒事，只合登臨不合悲。」¹⁰⁶ 感嘆了鄭氏亡國後北園化為佛門淨地的無常，呈顯了海會寺一地的歷史特殊性。這樣的主題也常成為後士文人描繪海會寺的主題。¹⁰⁷ 雖眼前是佛寺，卻褒貶了作為歷史搭疊的另一個空間。

102 巫仁恕、迪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頁 83-84。

103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392。

104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64。

105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404。

106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87。

107 宋永清，《谿翁詩草》，收入陳紅彥、謝冬榮、薩仁高娃編，《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二〇二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頁 148。六十七，《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 6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21。

而另一種書寫主題，則搭配了勸農主題，強調到訪海會寺，是巡視後的順道行程，而非刻意造訪。如孫元衡即曾作〈陪憲副王公、總戎張公偕諸僚友往觀禾稼，歸途讌集海會寺，抵暮而返〉為題，描述與上司及同僚大規模前往郊外視察農事後，於海會寺「回轡入禪林，停輿就夕陰。餓鷗鳴斗酒，飛騎致庖禽。布席山門敞，行廚竹徑深。雙榕亂黃鳥，鐘磬會清音」的過程。¹⁰⁸ 後如乾隆初期的滿漢巡臺御史書山、張湄，亦曾引率僚屬赴郡郊勸農，歸途入海會寺休憩，便以〈勸農歸〉為題，各咏五言律詩。¹⁰⁹ 對於海會寺的景致，以及與住持釋澄聲的互動各自留下紀錄。書山更曾打算著手修繕海會寺，然可能或因任期屆滿或其他種種因素，僅能「葺其門庭，而殿廡未就。」¹¹⁰

鄭經所留下的行館在進入清朝統治後，仍維持著園林規模，甚至更加增添。但在政治現實的考慮下，園林轉為官建佛寺。雖是如此，海會寺仍提供遊憩的功能，並從封閉的獨立園林，轉化成為開放的公共場域。

（二）夢蝶園、法華寺與火神廟

位於府城南郊、由隱士李茂春所築之夢蝶園（處），在其逝後被改為佛室。根據《高志》的記載，「夢蝶園，在府治社稷壇南數百步。先是，漳人李茂春寓此，築茅齋以寄放浪之情；扁曰：『夢蝶』。後易以陶瓦，清流修築，日增勝概，改為『準提庵』。」¹¹¹ 該佛室被改名為「準提庵」，並將草屋改為瓦舍，增添勝概之舉，《臺灣縣志》稱係「僧人鳩眾易以瓦，供準提佛於中」，似乎是僧人募款所為。但唱和更將之命名者，應是蔣毓英。乾隆初期的方志已稱：「寺田，在寺後荒埔一所約二甲餘，臺灣府蔣毓英給為香燈」。¹¹² 後志更直接稱「康熙二十三年，改今寺。」¹¹³ 另季麒光為準提庵募

108 孫元衡，《赤崁集》，頁 75。

109 六十七，《使署閒情》，頁 34-35。

110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196。

111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0。

112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67。

113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199。

修所寫的文章，係名為〈募修準提菴小引〉¹¹⁴，顯見其命名係在季麒光就任後至離臺前這段期間，正呼應康熙 23 年改名的時程。故綜上所述，應可確認係是由蔣毓英給予寺名準提庵並安排寺田以籌措營運的經費，此乃係是官員主導下的成果。

而更大規模的改建，則來自於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宋永清任內主導多項行政建設，¹¹⁵並著手規劃了準提庵的改建。當時的準提庵位於鳳山縣境內，宋採行的方式，則是藉由修築火神廟之便連帶進行舊寺的修築。根據其所撰的〈火神廟記〉的描述為：

嘗稽燧人氏……炎帝以火紀官，而為火師。陶唐氏有火正，曰祝融。《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災」。故凡州邑，皆置神而崇祀焉。予宰斯土，見祭燿之義，闕焉不講；而居民廬舍時或遭回祿者，毋亦出納之違時，抑亦所以祀之者未有寧宇也？因與同寅李諸羅集諸衿，捐俸樂輸；有不足者，一一肩之。擇爽塏於府治東南僧舍，易其制而高大之；固以磚瓦、施以丹漆，命工肖像，而致時享。中堂祀大士，後院洎兩傍構列禪室；繞以竹木、間以花果，背山面流，巍煥幽深，亦招提一大觀也。因顏其寺曰「法華」，仍令僧徹空主之。¹¹⁶

宋永清捐俸並匯集同僚及士子之力，於將庵東南僧舍大舉改建為官方認可的廟宇—火神廟，並且加入觀音奉祀，亦連帶增建了準提庵的設備與將環境大為美化。宋永清更將廟宇重新命名為法華寺，取代了原有的名稱。

除了對於信仰的虔誠，或基於祭祀火神以安定民心，宋永清要主導此修築的原因應在於該地已成為府城近郊的官紳遊憩空間之一，如季麒光的詩作所描述「漆園傲吏白仙踪〔蹤〕，明月濠梁一夢中，此日構榑尋舊隱，春風

114 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頁 381-382。

115 陳文達，《鳳山縣志》，頁 12。

116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77-378。

柳櫟正溪東。」、「丹堤綠岸隱斜曛，十笏茅堂樹樹雲，不是天涯耽勝事，樽前誰記永和文。」¹¹⁷ 宋永清可能也曾參加過某些於法華寺舉辦的聚會，或至該寺賞景。他的〈重過法華寺〉詩便云：「重過招提路，參差翠竹橫，曇花和露現，番樣傍雲生，了了參禪意，丁丁伐木聲，園丁挑野菜，老衲自分羹。」¹¹⁸

藉此，宋永清在寺建立了屬於自己所創的休憩設施—「息機亭」。從其〈息機亭小記〉中，可觀此設備的建立及用途。

予治鳳三年，民安其拙；作亭於夢蝶之園，名「息機」也。地可盈畝，而亭不數椽；護以烟蘿、環以竹木，青蔥陰翳森森萬木中，幾不知有塵忙躑躅也者。或而凭欄俯仰，直瞰巨流，大小岡山如奔目睫；澄懷滌慮，冷然如憑虛御風焉。對此栩栩初回，機心頓息；公餘一枕，其殆訪我於羲皇之上乎！用為記。¹¹⁹

宋永清刻意僅提及夢蝶園而非法華寺，似要略為隱其建立休閒設施之舉。康熙末年的貢生曾源昌作法華寺詩，則稱該亭為「觀射亭猶在，息機人未回（蓋射畢停驂處也）」¹²⁰，看似旁為射圃，而該亭則為射亭。透過該亭的建立，搭配一同更新法華寺樣貌，建造出一個宛如超脫俗世的異質空間，宋永清得以在自建之亭內飲酒醺醉間感嘆人生。¹²¹

如此空間的建立，隨即成為官員聚會的場地。宋永清前所吟云的曇花，孫元衡也特題詠「一叢優鉢曇花好，移得西天小本來。日色煙光浮紫氣，凌空誰為築瑤臺」。¹²² 他另有一首詩名為〈澄菴宋明府於法華寺左新構草亭落成，立秋之二日，陪濟菴寅長、偕亦遠張明府閒集其上〉，其云：「綠野軒

117 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頁 274。但季麒光通常稱該處為「蝶夢園」而非「夢蝶園」。

118 宋永清，《谿翁詩草》，頁 38。

119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頁 381。

120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1-272。

121 宋永清，《谿翁詩草》，頁 82。

122 孫元衡，《赤崁集》，頁 65。

車得偶亭，滄溟蹤跡幾浮萍。香飄古寺曇花見（寺有曇花一叢），秋到閒園蝶夢醒（寺本李氏夢蝶園舊址）。自有醉翁能載酒，不妨喜雨更名亭。應芟惡竹斜添檻，收取岡山百丈青。」¹²³ 描述了在立秋隔日，可能是為了歡慶修築工事完成，與臺灣縣知縣張宏等前赴宋永清（號澄菴）於法華寺左增建的草亭內飲酒聚會，除觀園景，並賞岡山景致。宋永清自身有一首〈花圃閒吟〉，雖未指出地點，但句中有「異種名花出海邦」，指的應就是前述曇花。而一群人一邊品茗，一邊欣賞蝶影與美景，清幽心境，堪可抵禦烈陽。¹²⁴

沿溪花覆地，遶逕竹成垣的法華寺，成為文士造訪的勝地。¹²⁵ 而法華寺承繼自夢蝶園，夢蝶園的名稱係來自於「莊周夢蝶」，這個主題往往成為官紳文士來此作詩行賦的主要發想，可謂頗能呼應禪修靜地的意境。¹²⁶

透過增修，夢蝶、佛寺、小亭與山水林木之景，共構成府城南郊一佛寺園林。而後，相形完善法華寺主要由內部的僧眾維持，因康熙 60 年（1721）地震損毀，於乾隆初年的重修行動，已是「不募諸施，皆僧人粒積而就」，分巡臺灣道劉良璧在乾隆 8 年（1743）僅作為立碑的署名者。¹²⁷

二、小幅增修

除於海會寺及法華寺等地進行大幅改建外，府城內外另有幾個宗教境地，官員們則採行較小規模的增修以妝點風華，包含竹溪寺與彌陀寺

（一）竹溪寺

同位在府城南郊的竹溪寺，又稱「小西天」。在高志中，已可見稱其為「其間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最為勝景。良辰佳節，騷客遊人多會於此。」¹²⁸

123 孫元衡，《赤崁集》，頁 75。

124 宋永清，《谿翁詩草》，頁 187。

125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2。

126 季麒光，《蓉洲詩文稿》，頁 78、274。宋永清，《谿翁詩草》，頁 167。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2。六十七，《使署閒情》，頁 125。

12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33-34。

128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0。

至晚在 17 世紀末已經是遊人造訪的佛門勝地，描繪詩文不斷。如宋永清便做有數首關於竹溪寺的詩作。如〈登小西天絕頂〉云：「春來梅柳鬪芳菲，散步清溪到翠微，怪石枯藤迷野徑，殘枝敗葉擁禪扉，踏開覺路香生履，振落天花色染衣，更上一層回首處，故山遙望自心違。」¹²⁹ 另〈竹溪寺〉詩中，也描繪了當地的佛門與自然結合的景致，並稱該日去寺時「落花滿地遊人少」，旁小字註：「淒涼悟出空寂妙諦未許淺窺。」¹³⁰ 或許是因為當日遊人特少，方讓宋知縣特別領悟出禪境。另如齊體物、生員張大璋也皆曾作〈竹溪寺〉詩。¹³¹ 竹溪寺的幽景，更在日後的方志內傳載不斷。乾隆中葉來臺任海防及理番同知的朱景英，在評比府城外的幾個寺廟園林後，更得出「惟南郊竹溪寺，境以幽勝，差堪遊憩」的評語。¹³²

除了作為遊人，官吏們不免也運用了竹溪寺的空間另作規劃。在康熙 32 年，當時的臺灣知府吳國柱曾附建「竹溪書院」於竹溪寺，甚至並造有吳知府的塑像；高志稱此舉係「守惠政在人，士庶輦石輸材，諭禁不能止。」¹³³ 而盧嘉興認為，康熙年間書院多附寺院，並非特例。¹³⁴ 寺有僧侶管理，或可因此兼管並提供餐宿等。而增築書院，或對寺院本體也可能有若干修葺。

但大體而言，官員在清代前期介入竹溪寺有限。

（二）彌陀寺

位於東門內永康里彌陀寺，應建於鄭氏時期。根據盧嘉興考訂，入清的重新創建者係為蔣毓英。¹³⁵ 彌陀室庭宇幽靜，佛像莊嚴，且旁邊種有檳榔樹，

129 宋永清，《谿翁詩草》，頁 88。

130 宋永清，《谿翁詩草》，頁 174。

131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5。

132 朱景英，《海東札記》，頁 50。

133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33。

134 盧嘉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1979 年），頁 243-246。

135 釋自憲，〈府城竹溪寺創建年代之考察〉，頁 170-171。

加以花香芬馥，是一可供遊詠之地。¹³⁶鳳山縣人張僊客即曾題〈彌陀室避暑〉詠至彌陀室避暑遊歷：

凌茫然萬頃，忽一葉抵平蕪。正宴集南皮、觴飛河朔，時候無殊。
選勝遍尋樂國，望彌陀，靜室汗收珠。好伴二三知己，應教空谷
維駒。偏從海外探蓬壺，誰論一身孤！任員嶠高深、瀛洲縹緲，
也是平途。欲上瓊樓玉宇，逢六月，且暫息良圖。兀坐蕭然有得，
詠歸日已將晡。¹³⁷

至康熙 31 年，臺灣縣令王兆陞在彌陀室書院，並留有肖像。¹³⁸而同樣的模式在隔一年便是前吳國柱在竹溪寺的情況。不過彌陀寺後來一度傾圮，至康熙 58 年（1719），恰有僧人一峯至自武彝來募化重興，得以再建；後並陸續有信徒添建寺產以為香火，而未見有官吏的介入。

不過重修後的彌陀寺，持續吸引著官紳前來遊歷。如曾參與重建府學大成殿的文士黃廷光，留有〈花朝遊彌陀寺〉一首，描繪了結伴過足寺間感受到的美景。¹³⁹而澎湖協標右營遊擊張駉也作詩「參差搖竹影，勝地造香林。不覺塵方淨，能生興轉深。佛壇著妙相，午磬響清音。佳境終難得，還同坐夕陰。」¹⁴⁰，應係與友人共遊後的紀念之作。皆為彌陀寺的遊憩功能，留下見證。

而寺僧喝能作詩，現存作品有〈雁門烟雨〉、〈鯽潭霽月〉等¹⁴¹，得與官吏仕紳有所互動往來。如巡視臺灣御史張湄有〈和喝能上人長至韻〉、〈遊彌陀寺贈喝能上人〉等詩，與之相酬唱。¹⁴²

136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0。

137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95。

138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33。

139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4。

140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72-273。

141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494、496。

142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200-201。

四、新建

官吏除了是寺廟的改建與維護者，亦可能擔任創建者的角色。如城北的黃蘗寺便是一例。

黃蘗寺在康熙 27 年由左營守備孟大志建，其所在區域也正是左營轄區，是個與武官較有關係的廟宇，但 31 年遭遇大火而毀。隔年，僧侶募眾重建，除新建廟堂祭祀關帝，後並祀觀音三世尊佛，且畢備僧房齋舍。四周則圍以竹木，更有諸多花果，清幽肅靜。¹⁴³ 遊憩紀錄不多，但仍偶有詩作書寫。¹⁴⁴

但並非所有官員修建或倡修的廟宇都會成為遊憩場域，如位於東安坊廣慈庵，後名廣慈院。高志稱此庵係由僧人募建於康熙 31 年，前有準提閣。庵旁「環植修竹、刺桐，俯臨沙流，前對小峯；亦幽靜處也。」¹⁴⁵ 原規模甚小，後因患病的諸羅縣知縣張珥祈求而痊癒，遂獻金增建，籌充嘉邑犁頭標大道公營田，年徵香租粟 65 石。¹⁴⁶ 但尼庵似乎不便遊人進出，並沒有成為遊憩場域。其案例可資作為對照。

前述小幅增修與新建的佛寺，規模不一，但共同構成了宗教休憩場域。誠如雍乾年間長期在臺擔任海防捕盜同知、臺灣知府與臺灣道的山尹士俚所述：「郡南門外有竹溪寺，東安坊有黃檗寺、彌陀寺，皆祀觀音，竹木蒼翠，極其幽致。」¹⁴⁷ 而龍湖巖似因為距離較遠，步行難以當天往返，除康熙 44 年有邑生洪朝樑重建¹⁴⁸，後有民塑諸羅知縣周鍾瑄之像於寺廟奉祀外¹⁴⁹，少見有官吏積極介入紀錄。

143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07。

144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802。

145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0。

146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20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頁 281。

147 尹士俚，《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1738 年原刊），頁 317。

148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283。

149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189。

伍、自然地景的詮釋

除了於人工設施內獨享個人時光，或邀集同僚與友人聚會，賞遊自然景色亦是內地官吏來臺必行的休閒與交誼活動。而除了賞景與書寫，因應旅途當中所需的人工設施也隨之新創或改築而現。

一、龍潭盛景

水是官紳賞遊必然的目標之一，項目包括江、河、湖、潭、海等。府城觀海位於西側，有寓望園、斐亭、澄臺，甚至於北園等，觀溪川則可在府署後方或法華寺、竹溪寺等地。而若欲於近郊覽湖潭景致，則需向東探尋。最重要者莫過於又稱為位於今臺南永康、仁德一帶、又稱為東湖、龍潭、鯽仔潭等的鯽魚潭。

鯽魚潭得名自盛產鯽魚，頗具漁獲經濟及稅收價值。而由於有水源可資運用，鄰近地區與潭內浮復地成為重要的農墾地。然經常性因夏秋雨季導致潭水遽增，水量暴漲，使疏導潭水也成為地方官面臨天災時的重要工作項目。¹⁵⁰

「周圍大十里餘，深不可測」¹⁵¹、「修而不廣」¹⁵²，屬狹長型鯽魚潭，在荷蘭時代已是一醒目的地標。在入清之後，「渟泓浩淼，實臺地一巨觀」¹⁵³的潭水風光陸續出現在官吏文士筆下。如，於康熙 34 年起任臺灣府學教授的林慶旺，曾作〈臺灣八景〉詩，其中的〈東湖即景〉，即註解「臺灣東郊有鯽仔潭，今改名東湖，文學吟詠頗多。」¹⁵⁴點出在其創作之前，已有諸多作品，並有雅士將之取名為東湖。而這個名稱或許欲與江南西湖做一對照，

150 簡宏逸，〈被農業覬覦的湖水：租稅政策與鯽魚潭的消失，1645–1900〉，收入劉益昌、Ann Heylen（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 年），頁 327、340–341。

151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65。

152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07。

15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156。

154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95。

詩中即云：「東湖今作西湖賞」，顯然給予「十里潭光天際映，四時野色水中描」的鯽魚潭極高評價，也將其從較小的潭、提升為湖的意境。而從「一葦舟行遊興闌，錦鱗磅礴共垂竿」的詩句，可推斷東湖遊覽，除了觀景外，尚有登船泛舟，以及下竿垂釣等行程。¹⁵⁵ 雖同樣是水境，較為穩定的湖潭，實能提供觀海較難施行的親身體驗。而這樣的描景，並陸續出現於後續的詩文當中。

官吏前來鯽魚潭，另一個重要且正當的目的便是來祈雨。在康熙年間已見記錄，康熙 42 年（1703），時任臺灣縣令的陳璘，因該年 5 月亢暘不雨，除啟壇禱雨，更於 6 月 8 日徒步往返鯽魚潭迎水，後果於 12 日得雨。¹⁵⁶ 而可能因甚為靈驗，後世更有「取水禱雨輒應」之稱。¹⁵⁷ 遂此，以龍為另名至晚在康熙五十年代已經出現。如康熙 54 年（1715）的例貢李霽，即以〈龍潭夜月〉為題作詩，《臺灣縣志》也指稱「禱雨之處，故曰龍潭。」¹⁵⁸ 而「龍潭夜月」更被列入臺邑六景之一¹⁵⁹，後世排列臺灣縣八景時，「龍潭夜月」或「鯽潭霽月」並列名不斷。

從府城官署至鯽魚潭，則可見一些中途的暫憩設施，其興築者或非官員，然卻成為官紳途經的造訪之地。位在小東門外、「臺地官僚省耕，皆憩於此」的李氏園即是一例。¹⁶⁰ 李氏園靠近先農壇¹⁶¹，而園內有一個聚星亭，係由倪象愷（1684 — 1745）任職臺灣知府期間所命名¹⁶² 即約在雍正 6 年（1728）至 8 年（1730）間。

李氏園與聚星亭兩者常被混稱，實際上的興築的年代不詳。《重修臺灣

155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95。

156 丁宗洛編，《陳清端公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44-45。

157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5。

158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207。

159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頁 3。

160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544。

161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頁 9。

162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542。

縣志》稱是「邑武解元李楨鎬園亭」¹⁶³，李楨鎬是康熙 56 年（1717）丁酉武舉¹⁶⁴。李的父親與伯叔皆是高壽，其父李文奇，為鄉飲賓。《重修臺灣縣志》稱壽九十六，而該志刊行於乾隆 17 年（1752），且乾隆 6 年（1741）就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の張湄也曾贈詩「梧竹陰森護短垣，群峯飛落聚星園。海翁九十髮如鶴，門外水田秋稼繁。」¹⁶⁵ 李氏家族在該地活動應已甚久，李氏園的年代或可溯推至 17 世紀晚期到 18 世紀初。

但為何關於兩者的紀錄大抵集中在乾隆前期？這涉及到赴鯽魚潭的行程安排。對該潭美景的描寫，很大一部份是在描寫月夜景色，故夜遊勢必就是前往該地的必要活動。在夜間行動，有一中繼休息站就甚為重要，而家族內有具功名者及任地方領導人士的李氏園，正可提供這樣的功能。僧人喝能的〈鯽潭霽月〉便提到「野迴天空水淼漫，銀蟾寫影已雲端。聚星亭落群峯碧，釣月船迴一棹寒。籟寂波光拖玉練，更闌斗轉盪珠盤。清池曾照禪心現，爭似東湖說大觀。」¹⁶⁶ 先至聚星亭，再至鯽魚潭乘船賞月。僧能或許是跟著臺地官紳一同前來，並共同以鯽魚潭為題而創作。

雍正初年，府城的木柵城陸續興工建築，連帶進出有了較多的限制。而位於城外長興里的先農壇，係臺灣縣知縣張廷琰於雍正 5 年（1727）新建於東郊長興里。每年仲春吉期，各官員出城齊集先農壇舉行耕藉禮，並例由巡臺御史擔任正獻官。¹⁶⁷ 官員齊聚且離開城區，自可規劃更多或以巡視為名的行程。且先農壇與鯽魚潭相距不遠。故官員們要至鯽魚潭，可待先農壇的儀式完畢後，即發往李氏園暫憩叨擾，於「綠疇四繞，青嶂當窗」¹⁶⁸ 的聚星亭欣賞周遭田園景致並遠眺群山後¹⁶⁹，再至鯽魚潭乘船賞月，於「敷政之暇偶

163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542。

164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358。

165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542。

166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494。

167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165。

168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544。

169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9。

爾憩息」。¹⁷⁰此或即是府城官紳的東湖遊歷與相互交誼的套裝行程。故先農壇成後的一、二年後，便有倪象愷為聚星亭命名，且乾隆年間の方志更開始記載此園。范咸的《重修臺灣府志》（簡稱「范志」）更將聚星亭歸類至「園亭」類當中。¹⁷¹

「春牛浦接鯽魚潭，綠竹蒼松翠色參。萬頃良田環郡郭，勸農人在聚星庵」¹⁷²一詩，當傳神的說明了官員們的行程。

二、寧南棧林

《范志》中特別各縣的園亭進行彙整，臺灣縣的部分，列舉了北園別館、陳氏園（已廢）、法華寺、聚星亭等，卻有一項從字面上難以一眼看出與園或亭有關者，為在寧南坊「棧林」。¹⁷³

對於清初來臺的官員而言，從海外而來的棧是一項未見的特別水果。蔣志的卷四〈物產〉「果之屬」內，花了七百多字介紹 19 種水果，而棧（芒果）一項便佔了 122 字。¹⁷⁴尹士俚也稱番棧為「果之異者」¹⁷⁵。閩省大員並時有進呈臺灣芒果、芒果苗，雖然被康熙皇帝認為「乃無用之物，再不必進」，但仍可看出地方大員視其為特別之物的心情。¹⁷⁶

在府城內寧南坊處，有眾棧聚集的棧林，而寧南坊為通往南郊的五妃墓、法華寺與竹溪寺等古蹟與名寺的必經之路。這片棧林，便成為官員仕紳結伴途經，或獨自沉澱思幽，與提筆書寫的場域。如孫元衡的〈閒遊羨子園林〉詩云：

杪秋似初夏，和風正輕靡。從遊四五人，出郭二三里；細路入幽篁，

170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頁 9。

171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542-543。

172 陳肇興，《陶村詩稿》（臺灣文獻叢刊第 1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47。

173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542-543。

174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69。

175 尹士俚，《臺灣志略》，頁 307。

1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七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頁 501-503。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冊，頁 746。

平沙渡寒洑。羨木行行直，崇岡面面起；故葉凝冬青，新枝垂暮紫。

茅居閒無人，遠患洵足美；門前百尺陰，蔭此一溪水。¹⁷⁷

乾隆3年（1738）舉人、善文工詩的陳輝，其〈依仁道中〉，也描述道：「踽踽行來望翠微，晚風吹度拂征衣；槎林斜影迷樵徑，竹塢繁陰引釣磯。」¹⁷⁸ 這個非刻意營造出來的場域，成為行旅途中的一個休憩空間，轉換了來者的情緒。

而槎林旁更延伸出「槎林宅」，原為鄭氏勇衛黃安之宅，後改為施襄壯侯祠，即施琅專祠。¹⁷⁹ 因位在槎林，加以施琅的平臺功績，遂連帶被提及。

陸、結論

做為國家的官僚，除了戮力於行政與建設外，群體交誼與個人休憩亦是其生活中的一部份，除可做身心調劑，亦是職場間的軟性往來契機，對於未來的仕途並或有若干幫助。

隨著清代統治的展開，官員於府城地區陸續改築或創設行政設施、教育機構與民生設施，並參與廟宇的新創與增築，而這些活動向為過往的研究者所關注。但官員在公務之餘，如何營造自己的休憩空間與活動，亦是其在臺活動的重要一面，卻較為研究者所忽略。彙整前述討論，這些建立起來的空間，包括衙署內的休憩空間（寓望園、斐亭、澄臺、安拙堂、射亭、豐亭）、獨立園林（北園）、廟宇佛寺（海會寺、法華寺、竹溪寺、彌陀室 / 寺、黃蘗寺）、自然地景（鯽魚潭、槎林）與民間設施（李氏園 / 聚星亭）等，若干並有承繼關係（圖1、2）。

官員們同為明清文人的一員，隨著明中葉興建園林的風潮以及文人園

177 孫元衡，《赤坎集》，77-78。

178 六十七，《使署閒情》，頁69-70。

179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468。

林的興起，加以觀遊深具禪意、與文人氣息相容的佛寺等風尚的形成，類似的模式亦被移植到臺灣來。這些散落於府城內外的官署園林、佛寺與遊憩場所，及伴隨著而來的文人傳統的娛樂（如園林文會、伶人奏演）與出遊形式，將臺灣改變成官員們熟悉的景象與模式，或可謂是一種文化殖民，是一呈現出地域被清帝國馴化的表徵。¹⁸⁰



圖 1 乾隆中葉府城一帶建築情況

圖片來源：《臺灣地圖》（乾隆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說明：本圖圖左為北，圖右為南。左方可見海會寺，上方則有先農壇與鯽魚潭。城內有道署、臺灣府署與彌陀寺等。

180 林淑慧，《再現文化：臺灣近現代移動意象與論述》（臺北：萬卷樓，2017 年），頁 85-87。

清代前期臺灣府城的官署園林及遊憩空間之創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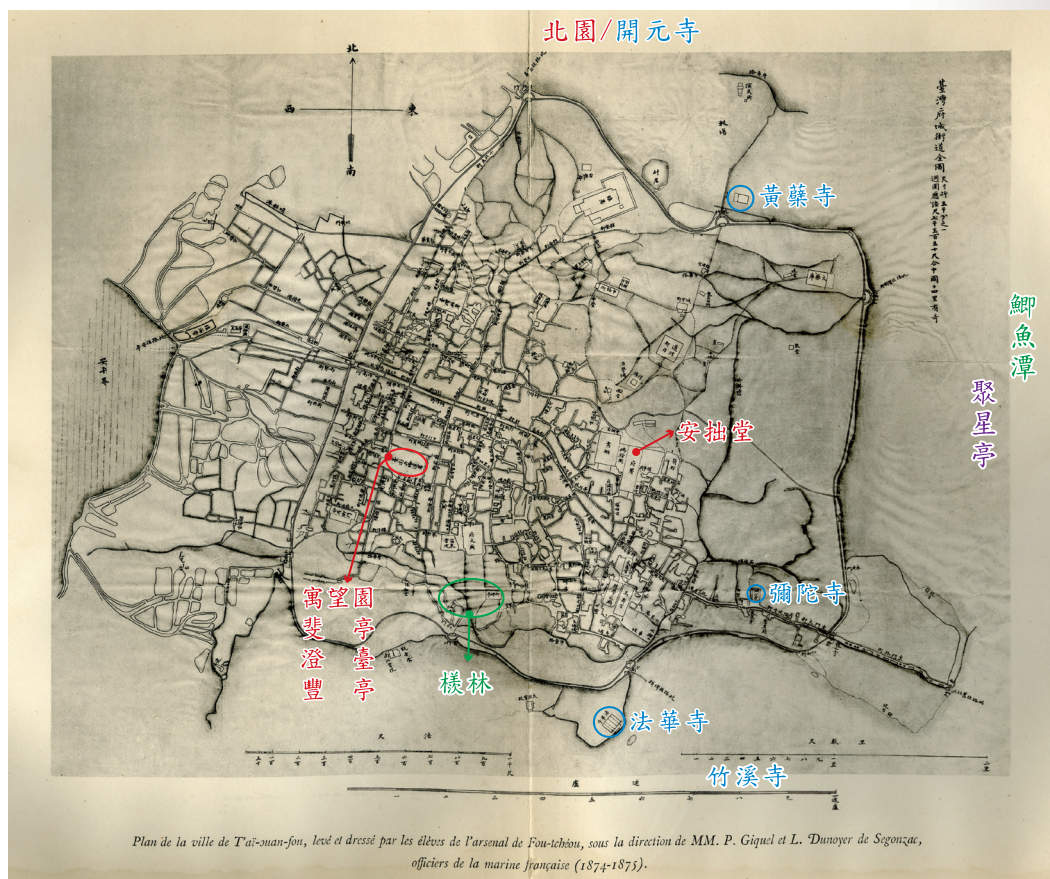


圖 2 清代前期府城地區的官署園林與休憩空間分佈概況

圖片來源：〈臺灣府城街道全圖〉。圖版取自 Camille Imbault-Huart, *L'île Formose :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1893 年原刊）。

圖片說明：底圖為光緒元年（1875）所製之〈臺灣府城街道全圖〉。設施名稱為筆者所加，紅色表官署園林及設施，藍色為廟宇，綠色為自然地景，紫色則為民間設施。

對於建園者與使用的官紳而言，這些場域提供了公暇時隱身園林百景內思索自我、頤養性情；或讓官員暫時卸下俗職差異，進行文會及賞遊。但包裝建構看似純粹的休憩場域，園林、遊景卻非僅是真實世界的摹寫，而是鏡像反射真實世界的異質空間。在仕宦任期當中，既要投身俗務，面臨繁雜的官場運作及交誼，卻又欲與現實保持某種距離，以維持文人的自身期許。於

仕與隱間，官署與園林，共構成仕與隱的二元空間語境。而這些曲徑通幽的異質空間，正提供了遊走切換的過渡。如何在進行所謂的「休閒」當中，保有官員的使命，又能盡舒自身的情懷，成為一種必須操作的微妙平衡。且在移植與新創間，涉及了諸多現實的考量。先是官員基於本籍迴避政策並有任期限制的情況下，難以長期經營或維護這些設施。而其來臺時，臺地已有若干舊有設施，也有內地省分沒有的景致與物產。故官員們如何在任期內創造與運用出這些空間與景致，成為其推動相關建設的另一項動力。

若依照設施的來源，可分為新造（包含在舊建築內的新創）的寓望園、斐亭、澄臺、射亭、豐亭與黃蘗寺，改築增建的北園、海會寺、法華寺、竹溪寺與彌陀室 / 寺，屬於自然地景的鯽魚潭與樣林，以及民間興造的李氏園 / 聚星亭。但也有由園化廟（一元子園亭）、荒廢（陳氏園）及未介入（龍湖巖）者。顯示官署園林與遊憩空間的建造，必須因應新附疆土內的自然環境、原有設施及官僚之間的互動角力下等各種複雜因素。

而就空間分佈來看，位居府城內有官署園林、彌陀室 / 寺及樣林，其餘則位於城外，就數量上並未有明顯落差，惟位於城外者規模較大。渡海前來的各級官員往往在臺原無居所，多暫棲官舍，加以在任期制下無法於一地長治久安，故以臺灣官衙為中心，在其內或周遭興建以官紳為主要使用者的官署園林，或亭、臺、書屋等可短期完成的小型休閒設施，成為來臺灣官紳致力營造的空間。而除擘劃新築，17 世紀中葉起，臺灣古典庭園設施之濫觴開啟，若干古剎前身也陸續建置，面對這些空間，隨著改朝換代而來的新朝文武官紳亦重新展開利用與詮釋。而山水勝景長久以來自是官紳暢遊的選擇，臺灣面海依山，景致多樣，府城周遭溪潭湖池散落，可資重新利用、開發。後透過文本書寫與詮釋，重新包裝這些場域，並合理化修築、改建與出遊的動機。在這些書寫中，少有強調奢華，反而強調的多是景致、風雅與虔誠的信仰等，顯示出與江南文人園林不同的風貌。

從建造的主要行動者身份來看，主要以文官為主，符合文人造園的傳統，當中並以道臺、知府等臺地重要官員為首。而這些場域的建設，部分或為使用其他建設的名目，連帶予以更新；但不少亦是由主要行動者發動捐貲，匯集同僚相助而成（附表 1）。與 18 世紀中葉以降，公眾建設援引地方紳商共力的模式不同，反應了這些建設的特殊性。

過往的府城建築研究，多半側重於官署設施及寺廟、城牆與城門等有形文化資產，或因受限於諸多官署園林與遊憩設施並非全然獨立的園林空間且分佈分散，以致探討仍欠聚焦，連帶解釋由之衍伸出的眾多文學創作與文化地景論述時有所侷限及誤讀，對了解府城建設面貌及官紳互動網絡實有所缺憾。本文透過以清帝國領臺至 1740 年代為觀察範圍，除重現屬創建時期府城重要官署園林及遊憩空間的詳細建築時程及變遷脈絡的複雜性，日後對於臺灣園林的發展、清代臺灣官衙建築的空間敘事及官場活動情景等之變遷，後續應可建立起更立體且深入的延伸探討。

附表 1 清代前期府城休憩空間主要行動者

姓名	官銜	地點與設施	創建或增修年代
蔣毓英	臺灣知府	法華寺	康熙 23 年
		彌陀寺	康熙 23 至 25 年間修葺
		安拙堂	康熙 23 至 25 年間
周昌	臺廈道	北園	康熙 25 年
		寓望園	
孟大志	<u>左營守備</u>	黃蘗寺	康熙 27 年
王化行	<u>臺灣鎮總兵</u>	海會寺	康熙 29 年
王效宗	臺廈道		
吳國柱	臺灣知府	竹溪書院	康熙 32 年
高拱乾	臺廈道	斐亭	康熙 32 年
		澄臺	
宋永清	鳳山知縣	火神殿（法華寺）	康熙 47 年
		息機亭（法華寺）	
劉良璧	臺灣道	豐亭	乾隆 5 年
		法華寺（重修撰碑）	乾隆 8 年
莊年	臺灣道	澄臺	乾隆 9 年
		斐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格說明：1. 本表係依主要行動者進行創建或增修之年代由遠而近排列。

2. 表中官銜加底線者為武官，未加者為文官。

參考書目

壹、古籍與檔案史料

丁宗洛編，《陳清端公年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六十七，《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 1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47 年原刊。

尹士俚，《臺灣志略》。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1738 年原刊。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1772 年原刊。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1705 年原刊。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吳振臣，《閩遊偶記》，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年。

宋永清，《谿翁詩草》，收入陳紅彥、謝冬榮、薩仁高娃編，《清代詩文集

珍本叢刊》第二〇二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杜臻，《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季麒光，《蓉洲詩文稿》，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上海圖書館藏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1747年原刊。

夏琳，《閩海紀要》。臺灣文獻叢刊第1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孫元衡，《赤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年。

連橫，《雅言》。臺灣文獻叢刊第16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連橫，《雅堂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20 年原刊。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20 年原刊。

陳肇興，《陶村詩稿》。臺灣文獻叢刊第 1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1736 年原刊。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41 年原刊。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臺灣文獻叢刊第 28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年。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1689 年原刊。

鄭經，《東壁樓集》。新北：龍文出版社，2011 年；1674 年原刊。

貳、專書

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巫仁恕、迪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5 年。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林淑慧，《再現文化：臺灣近現代移動意象與論述》。臺北：萬卷樓，2017 年。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的連續性問題》。新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

康格溫，《《園冶》與時尚：明代文人的園林消費與文化活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

張淑嫻，《明清文人園林藝術》。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 年。

黃靜宜等，《臺南歷史散步》。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年。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賴恆毅，《清代臺灣地理空間書寫之文化詮釋》。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 年。

Brook, Timothy, *Praying for Power :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mille Imbault-Huart, *L'île Formose :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1893 年原刊。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參、學位論文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陳至忻，〈園林與佛寺：清初臺灣官紳的交誼及其場所的重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 年。

陳冠妃，〈由熱蘭遮市到臺灣府城：臺南城市型態的演變與城市社會的形成（1624-186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7 年。

曾惠裏，〈臺灣傳統園林的歷史發展及空間特性〉，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

黃慶雄，〈清領時期臺灣隱逸詩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

肆、期刊或專書論文

王建國，〈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論清初臺灣園林／寓望園〈書齋八景〉之書寫語境〉，《文與哲》，36 期（2020 年 6 月），頁 205-255。

- 朱衣仙，〈異質地誌學與明清文人園林場域的相互證發〉，《東海中文學報》，4期（2017年12月），頁1-48。
- 吳建昇，〈臺江浮覆以前的洲仔尾地區〉，《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7期（2008年4月），頁193-231。
- 巫仁恕，〈江南園林與城市社會—明清蘇州園林的社會史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1期（2008年9月），頁1-60。
- 李文良，〈民田與請墾制度：清初臺灣田園的接收與管理〉，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年，頁27-56。
- 李知灝，〈權力、視域與臺江海面的交疊—清代臺灣府城官紳「登臺觀海」詩作中的人地感興〉，《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0期（2010年4月），頁9-43。
- 李乾朗，〈傳統建築—臺灣的古庭園〉，《房屋市場》，88期（1980年12月），頁94-99。
- 張婉真，〈試談中國園林的博物館概念〉，《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7卷8期（1997年11月），頁63-70。
- 張鴻愷，〈從《東壁樓集》及《延平二王遺集》看鄭經其人及明鄭王朝〉，《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7期（2008年6月），頁160-186。
- 許惠玟，〈由《寓望園記》到《提室十三勝記》：清代臺灣園記散文探析〉，收入朱歧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339-368。

陳冠妃，〈城市建設與圖像表達：以 1766 年臺灣知府蔣允焄《東瀛紀典》為例〉，《臺灣史研究》，26 卷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1-50。

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故宮學術季刊》，32 卷 3 期（2015 年 3 月），頁 1-62。

傅柯（Michel Foucault），〈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入陳志梧譯，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 年，頁 399-409。

曾曬淑，〈洲仔尾花園、大橋港—從古地圖及方志所作的考證〉，《臺灣文獻》，72 卷 3 期（2021 年 9 月），頁 7-46。

楊惠南，〈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再商榷〉，《臺灣文獻》，53 卷 2 期（2002 年 6 月），頁 99-112。

蔡承豪，〈清代臺灣府署「鴻指園」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8 卷 2 期（2020 年 12 月），頁 137-196。

盧嘉興，〈再談臺南古剎彌陀寺〉，《臺灣研究彙集》，12 期（1972 年 8 月），頁 17-18。

盧嘉興，〈竹溪寺沿革誌要〉，《臺南文化》，2 期（1976 年 12 月），頁 68-72。

盧嘉興，〈臺灣的名園〉，《幼獅月刊》，44 卷 5 期（1976 年 11 月），頁 15-20。

盧嘉興，〈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1979 年，頁 233-254。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1979年，頁269-320。

簡宏逸，〈被農業覬覦的湖水：租稅政策與鯽魚潭的消失，1645-1900〉，收入劉益昌、Ann Heylen（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年，頁327-352。

魏秀梅，〈清代任官之籍貫迴避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8期（1989年6月），頁1-36。

釋自憲，〈府城竹溪寺創建年代之考察〉，《世界宗教學刊》，19期（2012年6月），頁167-197。

龔顯宗，〈論《蓉洲文稿》的臺灣書寫〉，收入朱歧祥、許建崑主編，《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1-14。

The Gardens and Recreational Spaces of Taiwan Prefectu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sai Cheng-hao *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rule, spaces for leis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the gentry emerged in Taiwan Prefecture. For Qing officials posted from China to Taiwan, “heterotopias” such as official gardens and recreational spac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y and its outskirts were places where officials of all levels could mingle for literary gatherings and scenic tours. These recreational spaces were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rule of Taiwan to the early Qianlong reign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stand-alone gardens; gardens affiliated with government offices;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natural scenic sites; and privately owned facilities. While some were newly built spaces, more were renovations or expansions of existing structures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reation of these recreational spaces was mainly undertaken by civilian officials such as circuit intendants (*daotai*) and prefects (*zhifu*), who brought to Taiwan both facilities and cultural events, such as visits to gardens and temples, literary gatherings, and performances, thus setting the direction for

* Associate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Painting, Calligraphy,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PM.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s and recreational spaces for government offices in Taiwan Prefecture.

Keywords : Heterotopia, Natural Landscape, Buddhist Temple, Gardens

